

電信詐騙犯與兩岸風暴

在台灣叫做肯亞的肯尼亞遣送了一批涉嫌電信詐騙的台灣人到中國之後，兩岸之間的關係突然變得波濤洶湧。

台灣的民意代表對官員施加壓力、中國把遣送來的嫌疑人送上央視“認罪”、中國網民的“10個彎彎九個騙”等等，兩岸關係可以說是真夠差的了。

隨著5月20日的臨近，民進黨蔡英文領導的政府準備接任，兩岸關係看來大概似乎也沒有什麼好轉的機會。

這些詐騙嫌疑人捅出來的這個馬蜂窩看來還真不小，不過詐騙集團或者是中國所說的詐騙團夥為什麼敢如此大膽？

當然挑選第三地，尤其是相對較為落後的地方作為電信詐騙的基地，這些中國所稱的犯罪分子，目的就是要躲避司法的追查。

不過，“詐騙團夥”似乎也低估了中國的決心，如果這個問題影響不大，大概中國也不至於動員外交、司法等等部門，務求將嫌疑人捉拿到案。

把嫌疑人推上央視“認罪”方式，既可以殺雞儆猴又可以平民憤。

但是在台灣的老百姓看來，這就是一種“落伍”的“被認罪”，難以取信。加上台灣方面對中國司法制度的極度不信任，上電視認罪只是火上澆油。

台灣的問題：

自詡講司法、講人權的台灣，在這次也碰到了啞巴吃黃連的狀況，因為不是國際刑警組織成員等等的問題，所以把人接回來了，但是沒有調查資料。

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便是有相當證據的嫌疑人，因為證據不在手上，按照法律不能立案調

查或者起訴，所以下了飛機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留下聯絡資料之後離開。

等到經過種種“折騰”、拿到調查資料和相關證據而逮捕相關人等的時候，人們腦海裏面還是只有嫌疑人“興高采烈”離開機場的畫面。

而台灣之前對詐騙罪的判刑也被認為是“被輕判”，現任和即將上任的法務官員都不否認這是一個問題，許多詐騙罪罪名成立的被告，刑期之低“自己也看不過去”。

電信詐騙在中國境內猖獗，在台灣也不少見，兩邊的犯罪團夥也在犯行方面“密切合作”。反觀兩岸的執法部門雖然有所謂的司法互助協議，卻沒有聯手偵破這類的案件。

解決之道：

罪犯逍遙法外，絕對會讓人痛心、讓人覺得法律無用。不過從兩岸網民的說法看來，似乎絕大多數已經流于所謂的民粹。

順口溜“十個彎彎九個騙”對上了“十億人口九億騙”，網上互罵聲一片，這反映出彼此認識的薄弱和文化認知的差異。

而在這一片吵罵聲中，似乎每個都是仗義執言，但是沒看到如何解決電信詐騙這種越洋跨海犯罪的方法。

一個心理學者告訴我，很多罪犯之所以精密手法犯罪，就是認為如此就能“心安理得”地把犯罪所得視為己有。

這麼說來，似乎雖然重判是必要的手段，但是不見得能夠讓電信詐騙這種犯罪行為灰飛煙滅、從此在人間絕迹，但是如果搭配積極的查辦的話呢？

兩岸都有電信詐騙的受害人，兩岸也都有電信詐騙的罪犯，在彼此罵來罵去的時候，受害人繼續受害、電信詐騙的罪犯繼續行騙……

如果這次選舉為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鋪平了道路，使其成為階級鬥爭的戰場，那麼它將是一堂實實的政治課，加深中國人對民主本質的認識。

中國人將看清，民主不是終結階級鬥爭的萬能靈藥。他們還將發現，雖然金錢利益在西方民主國家具有巨大優勢，但民眾偶爾也有做主的時候，能夠違背精英階層的意願，去影響國家的前進方向。此外，即使在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民主政治的結果既可能是自由主義的，也可能是民粹主義或反自由主義的。

特朗普對中國人觀念的影響，不僅局限於民主議題。中國人對美國外交領域鷹派鴉派的想法乃至偏好，都可能因他而發生改變。

傳統上，中國意見領袖們更傾向於接受溫和的國際主義者（不論他來自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比如老布什和比爾·克林頓，因為他們似乎願意把崛起的中國接納到當前的世界秩序中去。相反，共和黨的新保守主義者和民主黨的干涉主義者，比如小布什政府里的一些勢力、希拉里·克林頓，甚至巴拉克·奧巴馬，都令中國人如芒在背。因為他們推行積極遏制中國的政策，甚至干涉中國內政。有趣的是，在世界許多國家看來，奧巴馬在海外動用美國硬實力時，保持着高度克制；然而在許多中國人眼裏，他充滿敵意，正是其“轉向亞洲”政策，製造了中美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

特朗普使中國人開始重新思考。他把美國的困境怪罪到中國頭上，並宣稱當選總統後將削減貿易，切斷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源泉。在競選中，他針對中國發表了一系列極具敵意的辭令，在大洋彼岸引起了高度關注。在國防事務上具有強烈民族主義立場的解放軍軍官戴旭，將特朗普比作美國的希特勒，譴責其在贏得新罕布爾州初選後發表的演說是“一個帝國主義分子的戰爭演說。”

然而如果特朗普當選總統，他極有可能避免在地緣政治以及人權等內政問題上，對中國進行強勢挑戰。特朗普甚至數度對中國取得的成就表示欽佩。無論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還是令中國人焦慮不安的“專向亞洲”政策，都可能在特朗普的任期內化為泡影。他甚至宣稱，除非日本和韓國願意分擔美國軍費，否則美國將削減其對盟國的防禦投入。

長期以來，中國人一直認為美國如果轉向專心解決其內部各種棘手問題，對中美兩國都更有益。中國外交學界著名鷹派學者金燦榮認為，特朗普是個實用主義者，而“中國人愛跟實用主義打交道”。

沒有人會懷疑，一旦特朗普領導美國，中美之間將展開一場激烈的競爭，競爭是件好事，並不害怕美國這樣的競爭對手，競爭是件好事。中國一向抵制和反感的，是執意按照自身形象改造世界的美國。可以肯定，唐納德·特朗普代表的，絕不是那樣的美國。

在這個沸騰的美國之春，特朗普猶如一頭在瓷器店裏橫衝直撞的公牛，粉碎了中國人的民主敘事以及地緣政治觀點。成也好，敗也罷，特朗普已經在太平洋彼岸留下了一連串困惑、衝突和新發現。

「南海仲裁庭」嚴重不公 中國不會承認

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預計5月底或6月初就將公布結果。而從2015年10月底的初期階段裁決來看，“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已無公正可言，這也使其即將公布的所謂仲裁結果難以令人信服。筆者認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嚴重不公體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仲裁庭組成和仲裁員指定存在暗箱操作嫌疑。因持不接受、不參與立場，中國政府不可能指定自己的仲裁員。鑒于本案一方缺席，仲裁員的選擇與指定本不需十分謹慎，可是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柳井俊二在釣魚島爭端最嚴重、中日關係極度緊張的情況下並未主動回避，而是在2013年4月指定斯里蘭卡法官品托擔任仲裁庭庭長。但隨後品托法官擔心真相暴露主動辭職，原因是其夫人是菲律賓籍。這一環節不得不讓人懷疑這個仲裁庭的透明性。

其次，被指定“代表”中國的仲裁員投票支持菲律賓讓人匪夷所思。2006年8月25日，中國政府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8條規定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書面聲明，對於《公約》第298條第1款涉及海洋劃界、領土爭端、軍事活動等爭端，中國政府不接受《公約》第15部分第2節規定的任何國際司法或仲裁強制管轄。在這點上，中國佔據絕對優勢。不過，菲律賓政府故意避開第298條的排除適用，提出條約適用和解釋的訴訟請求，繞過涉及領土主權問題的實質。本案荷蘭籍仲裁員松斯幾年前就曾公開撰文認為島礁地位與劃界和主權問題密不可分，但現在卻出爾反復。特別是被指定“代表”中國政府的仲裁員本應公正支持中國立場，但在本案程序階段裁決中，這位仲裁員不僅沒為中國政府說一句公道話，反而投票贊成

菲律賓的訴訟請求。最終，五位仲裁員在表決中一致支持菲律賓，故意迴避主權、海洋劃界等實質問題，這不得不讓人懷疑仲裁員的職業良知以及裁決本身的公正性。

第三，程序階段的初步裁決不符合國際慣例。眾所周知，程序階段裁決必須明確解釋和論述菲律賓的15項訴訟請求是否具有可受理性並屬於仲裁庭管轄。當時，仲裁庭的裁決只明確7項具有可受理性，另外8項本應予以駁回。但仲裁庭偏袒菲律賓政府，把剩餘8項直接列入實際審理階段，其中就最後一項要求菲律賓政府提供進一步的書面意見。這實際上等於對剩餘8項大開綠燈，明目張膽支持菲律賓的訴訟請求。

第四，仲裁庭裁決居心叵測。對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中國政府不接受、不參與的立場堅定、觀點明確。為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政府不應訴的理由，2014年12月7日中國政府發布關於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題的立場文件。當時，中國駐荷蘭大使館將立場文件以便函而非照會形式寄給仲裁員，並專門注明不能視之為中國政府參與仲裁或接受仲裁庭管轄。但即便如此，仲裁庭仍然將之視為中國政府有效答辯，其背後用心令人費解。

面對仲裁程序存在嚴重瑕疵、仲裁員喪失中立立場而偏袒菲律賓等種種現實情況，“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如果最終做出不利于中國的裁決結果並不出人意料。中國政府不會承認更不會執行裁決結果。（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教授潘國平）

美國大選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地產商特朗普的崛起不但震驚了美國，也給中國精英提出了難題。如何符合邏輯地向公眾解釋特朗普現象？4月19日，美國權威政論雜誌《外交》(Foreign Affairs)刊登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世默文章“Watching American Democracy in China”，剖析了特朗普現象在太平洋兩岸造成的衝擊波。文章不代表本報觀點，僅供參考。

在這個猴年里，美國總統競選吸引了無數中國人的眼球，而主角非唐納德·特朗普莫屬。究竟什麼是民主的本質？到底誰當選美國總統對中國有利？通常意義上的專家們這次都找不到北了，沒法向中國公眾解釋。

特朗普的成功讓很多自由主義者難以接受

幾十年來，中國存在着兩套相互平行、卻不可調和的敘事，左右着人們對於美國政治的理解。保守派呈現給公眾的是紙牌屋版本的美國民主：西方民主是虛假的，民意受到金錢和特殊利益的操縱，體制被濫用于牟取私利。相反，自由派注重宣傳的是民主女神版本：美國人民能夠通過選舉政治領袖決定國家命運，與國內一黨統治有雲泥之別，這種多黨選舉制才應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

既然美國是當前時代的民主旗手，那麼以上兩種關於美國政治的對立觀點，自然在極大程度上影響着中國人對民主體制、乃至本國政治前景的看法。然而在面對美國房地產大亨特朗普時，中國人不得不重新評估他們對美國政治制度的認識。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現象可能顛覆中國人對民主的普遍看法——其程度取決於美國大選的結果，及其帶來的長期影響。

在地緣政治領域，專家們的觀點也高度分化。特朗普以好戰的言辭抨擊外國對手，中國與日本、墨西哥都成了他的靶子，這似乎必然惹惱中國的鷹派。然而，他卻不加掩飾地贊嘆中國取得的成就；在外交上主張減少對外干預，這使局面變得複雜和難以判斷。

那些貶損美國民主的人這次看錯了，特朗普的崛起好似象徵着財力雄厚的共和黨精英在普通美國人的包圍下，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雖然特朗普自己就是富豪，但這並不矛盾：他以局外人的角色殺入戰局，被看作是對美國政治體制的反抗。他的政策立場迎合的是美國工薪階層的利益；而且迄今為止，他花在競選上的錢，只相當於其他候選人的一小部分。在某種程度上，伯尼·桑德斯出人意料的強勢，反映出民主黨陣營也出現了類似現象。

這種現象與中國保守派的說教相左：因為如此看來，美國“人民”最終或許還是能夠決定國家命運的。

中國的《環球時報》在某篇社論中，用“大嘴”、“粗暴”等字眼形容特朗普，認為特朗普現象凸顯了美國政治制度的衰落，毫不掩飾地表達幸災樂禍態度。然而該報不但在另外兩篇社論中解釋道，美國精英們給特朗普的大批支持者貼上民粹主義標籤，恰好反映自身已“喪失了理性”；甚至一百八十度大

轉彎，稱特朗普是名聰明機智、適應性強的商人，並祝他好運。

中國官方的新華社一向把美國民主稱為富人的遊戲。然而在報道特朗普時，該社卻認為不可一概而論：“華爾街被視為美國總統大選背後的資金支持一大來源。各路競選人萬萬不敢得罪這些實力雄厚的錢袋子。不過，自己有錢的特朗普卻並不買華爾街的帳。”

中國的自由派也處於左右為難的困境中，充滿憤怒和絕望。他們雖然痛恨特朗普，卻難以開口

從中國看特朗普現象與美國民主

維護美國精英階層，說富人們是對的、民眾是錯的。這麼說無疑將有損於他們試圖在中國樹立西方民主的高大形象。畢竟，如果民眾可能犯如此巨大的錯誤，怎麼還能讓他們投票？

在某位著名的自由派評論員口中，特朗普的支持者類似中國的“毛左”，他們沒有大學學位，屬於“美國被遺忘的群體”。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上，名嘴們要么貶低特朗普，管他叫“特大炮”；要么只能拾人牙慧地重複其罪狀，批評他是個一無所知的騙子。還有位自由派評論員，說特朗普的調門“赤裸裸地近似法西斯……”

自由派對特朗普的反自由主義世界觀嗤之以鼻。然而，特朗普在選舉中節節勝利，這更令他們如鯁在喉：因為長期以來，自由派一直宣稱，選舉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礎。他們大都把希望寄託在希拉里·克林頓身上，期盼她取得最後的勝利。

的確，在特朗普現象的影響下，中國人對美國民主的看法開始跳出刻板印象，超越保守派和自由派意見領袖為公眾準備的兩套“企劃書”。一個更複雜、更現實的畫卷正呈現在中國人眼前。

混亂與絕望之外，大多數中國人本能地把握住了特朗普現象的一個核心主題：階級鬥爭。在中國，幾乎每篇關於特朗普的評論文章，都指出一個事實，即特朗普的支持大多來自工人階級。一些權威人士採用美國的話語，將特朗普的崛起稱作“來自99%的復仇”。《中國青年報》刊登統計數據證明美國中產階級正在萎縮，並以此來解釋特朗普現象。

鑒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遺產，人們有這樣的認識並不奇怪。自從西方取得冷戰勝利以來，中國人基本上接受了這樣一種觀念，即西方國家通過民主政治，已成功解決了階級鬥爭問題。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階級鬥爭曾走到極端，導致了極大的災難。在西方民主國家，階級界限彷彿已被消除，這令中國人尤其羨慕。然而，特朗普的競選卻向世界昭示，階級鬥爭的止息可能僅是幻象。美國工人階

級其實很憤怒。

中國公眾可能會驚訝地發現，他們的認識與美國許多思想家不謀而合。早在特朗普于選戰中過關斬將之前，《大西洋月刊》刊登戴維·弗魯姆文章，把選舉制目前的混亂，歸因於數十年來精英階層對美國中產/工薪階層利益的忽視，甚至背叛。精英們一方面倡導全球化，一方面成為該進程最大的受益者，而普通美國人的收入則停滯不前，甚至下降。同樣，精英們宣傳的文化多元主義，給富人和企業帶來了好處，因為移民降低了勞動力成

本，引入了更多人才；但也導致美國工薪階層失去就業機會，社區凝聚力受到外來者的威脅。其實，類似情緒在桑德斯的支持者中也會產生共鳴。

早在2014年，邁克爾·林德就曾在論文“即將到來的重組”里寫道，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都是由鬆散支離的聯盟組成的。在共和黨方面，資本主義精英向美國工薪階層提供基於社會價值觀和身份認同的種種主張，比如反對墮胎和種族政治，以形成社會基礎獲取執政多數。至於民主黨，也讓黨內經濟精英與持自由主義社會觀的普通美國人達成聯盟。換句話說，兩黨都是以華爾街和企業精英為主導的，它們像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一般輪流執掌權力，但實質性政策大同小異，都無視黨內草根階層的經濟利益。簡而言之，階級鬥爭在國家層面上成為可行的政治力量之前，兩黨先通過黨內結構將它吸收或壓制了。

林德預測，這種結構是不可持續的。在美國政治中，社會價值觀已逐漸不再是主要的政治斷裂線，工薪階層美國人將不斷團結，為自身經濟利益與精英們展開鬥爭——後者是資本與技術的擁有者與支配者。這種重組將跨越政黨的界線。林德還無法判斷的是，剛形成自我意識的美國工薪階層，將以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作為自身的政治基礎。在這次選舉中，特朗普和桑德斯分別代表了各自政黨的工薪階層。現在看來，即使特朗普最終落選，他帶動起來的趨勢將把共和黨改造為美國勞動人民的政治基礎，同時在民主黨內造成分裂。這種新獲得賦權的民粹主義，可能給美國政治帶來大洗牌，影響波及未來幾代人的命運。

在這種情況下，共和黨將成為美國勞動人民的先鋒隊，維護並擴大社保和醫保、通過限制移民和貿易以保護就業，並對代表全球化資本精英利益的對外干涉的外交政策予以約束。屆時，民主黨將獲得城市精英階層的支持，這個人群能從自由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移民以及干涉主義外交政策中獲益。

